

晚清時代的澳門詩詞

《澳門詩詞箋註·晚清卷》前言

章文欽*

從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鴉片戰爭爆發，到宣統三年（1911）辛亥革命爆發的七十餘年，構成中國歷史上的晚清時代。這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一個災難深重的時代，西方列強的窺伺和侵略，清朝政府的腐敗和無能，使中國處於亡國滅種的邊緣。鴉片戰爭後，葡萄牙緊步英國後塵，於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846-1849）間，強行在澳門實行殖民統治，並逐步侵佔澳門半島全部及由仔、路環兩島。光緒十三年（1887），在英國的操縱下，葡萄牙與清政府簽訂不平等條約中葡〈和好通商條約〉，獲取“永居管理澳門”的權利。這樣，體現中國對澳門主權的領土所有權和統治權被強行分割，澳門從明清時代葡萄牙在中國領土上的居留地，轉變成晚清時代葡萄牙管治的中國領土，中國對澳門的主權受到嚴重的侵害。在此期間，雖然有林則徐、鄧廷楨、張之洞和吳大澂等愛國的封疆大吏，順應士紳百姓的要求，採取一些補救的措施，仍然無法挽回大局。新寧趙天錫的〈濠鏡〉詩：“航海初來借一枝，卑棲安肯室堂窺。疆臣亦有深謀慮，大局瀾翻異昔時。”生動地概括了從明清時代到晚清時代澳門的歷史變遷。本卷選入晚清時代五十九位詩人吟詠澳門的詩詞二百六十九首，亦可視為這一時代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份。這些詩詞在時間上上承明清時代，下啟民國時代，其歷史文化內涵，亦可從對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分析中，獲得初步的瞭解。

作者及其時代

晚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其社會身份大約可分為官員、商賈、僧人、士紳、塾師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官員、士紳和塾師。

自道光末年，澳葡當局驅逐駐紮澳門的香山縣丞和澳關委員，在澳門實行殖民統治以後，澳門很快成為清朝政令所不及的地方。與明清時代中國官員不斷巡視澳門形成鮮明對照，清朝官員的足跡已

罕及澳門。晚清時代作為清朝官員與澳門結下因緣並留下詩作的，祇有張玉堂、陳徵文、尹恭保和易順鼎等數人，這裡值得一述的是陳徵文和尹恭保。

陳徵文字謹菴，福建長樂人。同治、光緒間宦粵垂五十年，負干濟才，明敏善斷，屢薦卓異，而以巡檢微員終其身。宦橐蕭然，而人不敢以私。袍服時付質庫，乃暇則貰酒留賓，拈韻賦詩，自謂“生平所好，惟此一事。”謹菴大約於光緒七年（1881）在香山黃梁都巡檢任上曾至澳門，留下〈濠鏡雜詩〉八首，多為吟詠澳地風物之作，第一

*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所做課題《澳門詩詞箋註》之論述之一。

首云：“竟許西夷受一廬，遂令聲教阻南天。可憐臥榻旁餘地，鼾睡他人四百年。”意謂葡人納租受廬，居留澳門，已令“天朝”的聲教在南方受阻。宋太祖尚曉得臥榻之側，不容他人鼾睡。明代以來的地方官府，居然在臥榻之側留下一片餘地，讓西洋“夷”人在此鼾睡了四百年。第八首云：“商情凋弊戍兵疲，殘局猶思勉強持。須識聖朝柔遠意，不論強弱盡羈縻。”反映了在西方列強虎視眈眈、瓜分慘禍逼在眉睫之際，清政府不但對西方列強毫無招架之功，連對貧弱疲憊的葡萄牙也無還手之力，祇能一概“羈縻”。在苦苦維護“天朝”尊嚴的字面背後，隱含挾當時士大夫回天無力的沉痛。

尹恭保字仰衡，江蘇丹徒人。同治元年（1862）舉人。四上公車不第，改官粵東，見知於兩廣總督張之洞。中法越南之役起，受命監廣西軍，提督馮子材尤器異之。光緒十一年（1885）諒山之捷，出力頗多。後署雷州、韶州知府，頗有治績。仰衡大約於十三年（1887）隨廣東巡撫吳大澂查勘澳門望廈等村和附近各島，留下長詩〈爭濠鏡〉。時值中葡〈通商和好條約〉簽訂前夕，吳大澂之赴澳查勘，顯然為勘明澳界羈縻，採取補救措施。出巡時雖然牙旗組練，高艦艨艟，儀仗吡赫，但其時金甌殘缺，徒增憂憤，已無復明清時代巡視者的豪情。詩中云：“葡萄牙乃小國耳，垂涎此島謀居奇。上叩天關擬條約，夜郎自大忘其弱。比例旁擬英注黎，香港百年棲部落。……澳民喜睹使節至，火炬夜起陰陵中。吹蠡擊鼓訝生佛，是日海氣開鴻濛。嗟念蒼生駐柴戟，召彼象胥喻順逆。明時濠鏡本彈丸，沉納金縢入賦籍。馳書辯摺聞於朝，猶畀一隅止遠客。譬諸秦寺開矣尼，不使華民失阡陌。持是可以告職方，遠臣耿耿蘊籌策。”將這首詩與康熙間杜臻、吳興祚所作的同類詩篇相比較，可以看出時代已發生極大的變化。再將其與吳大澂本人在巡視後所上的奏摺相比較，又可以看出詩人的筆端，仍在極力維持這個江河日下的“天朝上國”的尊嚴，以及吳大澂這位補天乏術的“天朝大吏”的體面，可謂用心良苦，從而使其在抒寫誠摯愛國熱忱的同時，又殘留幾分虛驕自大的氣味。

官員一旦去職，或遷徙流寓，或在籍鄉居，與已獲功名而未有官職者皆稱士紳。晚清士紳是一個龐雜而頗具影響的社會階層。與澳門結下因緣並留下詩作的晚清士紳大約又可以分為遷客寓公、愛國志士和香山籍士紳三類，下文分別舉其較重要者。

遷客寓公之較為重要者，可推何紹基和張其淦。何紹基（1799-1874）字子貞，號東洲、喤叟，湖南道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國史館協修、纂修、總纂、提調，歷典福建、貴州、廣東鄉試，得士稱盛。咸豐二年（1852）任四川學政，平反命案枉死者十七人，奏參總督、布按等官，置承審官七人於法，閭閻稱快，而權貴側目，率以事落職，遂絕意仕進，日徜徉於佳山勝水之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平生曾三度至粵，同治二年（1863）至粵時，作澳門與香港之遊，留下長詩〈乘火輪船遊澳門與香港作……〉。鴉片戰爭以後，具有先進思想的中國士大夫要求瞭解世界之風日熾，有能作西洋之遊者，被視為空前壯舉。其未能遠渡重洋者，亦每借澳門與香港為海外之遊。子貞自云：“平生足跡遍行省，今日得此韻外遊。”其時所詠及於西方蒸氣輪船、車輛儀器，以至格致之學、同文福音，視野開闊，可謂得風氣之先，從而在近代中國人瞭解西方的歷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跡。

張其淦（1859-1946）字豫荃，廣東東莞人。光緒五年（1879）舉人。後入學海堂，遊於碩儒陳澧之門。十八年（1892）成進士，選庶吉士。二十二年（1896）授山西黎城知縣。二十七年（1901），因教案以“保教不力”去職。歸籍任龍溪書院山長達七年。嗣因涉嫌案大白，遷安徽候補道。宣統二年（1910）改安徽提學使。辛亥後以遺老自居，隱於滬上，著述吟詠以終。

豫荃大約於歸籍後曾作澳門之遊，留下詩作二十六首。其〈初到澳門，用陸放翁〈初到榮州〉韻〉以賈誼遷長沙喻自己的澳門之行。其時報國無門，壯心已灰，祇能到這淪於異國統治的澳門暫寄萍蹤。“居夷不陋孔丘語，壯心欲泛張騫槎”之句，正是對澳門之行無可奈何的解嘲語。然逐臣遷

客，浪槌天涯；家國憂患，身世羈愁；中年哀樂，蒼茫百感，祇有在澤畔行吟中時時排遣出來，以稍舒其胸中磊落抑塞之氣，因而在這首詩和其它詩作中留下許多“牢騷詩句”。

愛國志士之較重要者，則推魏源、康有為和邱逢甲。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陽人。早歲遊幕江蘇，英人侵犯海疆，參與浙東抗英。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進士後，歷官東臺、興化知縣，高郵知州，政聲卓著。默深為近代著名思想家、學者、詩人，後世將其與林則徐、龔自珍合稱龔魏林。平生著述甚豐，而以介紹各國史地政情的《海國圖志》影響最大。

默深大約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正月作澳門與香港之遊，為增訂《海國圖志》搜集資料。遊澳後作〈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詩中所詠的洋琴，即清代詩人屢有詠及的西洋風琴。詩的開頭描寫詩人乘舸天風，遨遊四方，被吹送到充滿西洋情調的澳門。接舸描寫白鴿巢園及園中的百鳥，由百鳥和鳴的自然界語言，轉入人類的音樂語言——庭園女主人美妙動人的風琴聲。進而描寫風琴的音樂效果，而以與澳門關係至為密切的大海，作為琴曲的主題。萬里遠航，關山阻隔，阻不住西洋人對祖國和親人的思念之情。當帆船乘舸順利的風信返回澳門，整座城市都充滿舸親人團聚的歡樂，百鳥彷彿在為此而啼叫，鮮花彷彿在為此而開放。樂聲時而急促亢奮，時而珠圓玉潤；或如風雨交加，或如響箭齊鳴。後來樂聲逐漸變輕，戛然而止，宛如孤雁，劃破長空，海波不揚，萬籟無聲。詩人最後抒發感慨，感到中國人與西洋人雖然在地理上相距遙遠，卻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彼此的感情是可以溝通的。默深詩所詠雖僅及西洋風琴，然其澳門和香港之遊，時距鴉片戰爭不久，對《海國圖志》的撰寫有很大的幫助，從而在近代中國人瞭解西方的歷程中留下重要的印記。

康有為（1858-1927）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門人稱南海先生。出生於以理學傳家的封建士大夫家庭，早歲受業於名儒朱次琦，博通經史。後因廣東瀕臨海外，得風氣之先，受西方資本主義

思想文化的影響，逐步形成維新變法的思想。光緒十六年（1890）在羊城設萬木草堂，授徒講學，培養維新人材。二十一年（1895）入京會試，適值中日〈馬關條約〉即將簽訂，聯合各省舉子一千多人上書光緒帝，要求拒和、遷都、變法，史稱“公車上書”。同年成進士，繼續在京組織強學會，在滬設立分會，推動各地設立學堂、報館，鼓吹變法維新。二十四年（1898）支持光緒帝發動百日維新，冀圖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實行全面改良。變法失敗，被迫流亡海外。晚年思想逐步落伍。

長素於光緒十三年（1887）秋遊香港和澳門，作〈香港觀賽珍會閱歐戲，遂遊濠鏡觀馬戲，為見歐俗百戲之始〉，詩云：“香江陸海感蒼茫，濠鏡山川對夕陽。若問先生果何見，詭奇馬戲及蠻裝。”詩人於光緒五年（1879）秋首次遊香港，受西方資本主義文物制度的影響，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這一次香港、澳門之行，使他又一次接觸到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對其維新變法思想的形成，顯然有舸積極的影響。結合上文魏源、何紹基和下文邱逢甲等人的澳門和香港之行及詩作，說明沿至近代，澳門仍與香港並列，成為中國人瞭解世界、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窗口。

邱逢甲（1864-1912）字仙根，號蟄仙，廣東鎮平人，生於臺灣。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授工部主事。不樂仕途，告歸臺灣，授徒講學。甲午戰爭事起，組織臺灣義軍護臺抗日。清廷割棄臺灣，刺血上書，力爭無效，遂倡建臺灣民主國，唐景崧為總統，自任副總統兼大將軍。屢挫敵鋒，至援絕饑窮乃內渡，奉親歸鎮平故里。致力於教育，主講潮州韓山、東山等書院，創辦嶺東同文學堂於汕頭，以歐西新法教育青年。曾任廣東總教育會會長、廣東諮議局副議長。辛亥革命後，被推為廣東軍政府教育部長、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長，旋病卒。

仙根早歲居臺即以詩名，數十年復顛頓於人事世故，家國滄桑之餘，皆足以鍛鍊而淬礪之，其所為詩益蒼涼慷慨，復與易順鼎、陳三立、康有為、黃遵憲、潘飛聲諸人遊，造詣益深，詩格益高。他於光緒二十六年（1900）赴南洋聯絡僑民，考察教

育，道經澳門，留下〈澳門有贈〉和〈澳門雜詩〉十五首。其中〈澳門雜詩〉第一至三首諷刺明清官吏昏庸誤國，致令葡人佔據澳門。他在二十一年（1895）離臺內渡時，曾作詩痛斥投降派李鴻章賣國割地斷送故國山河。這時來到同樣淪入異國統治的祖國領土澳門，首先在詩中鞭笞自覺輿圖，將祖國江山拱手送人的庸俗官吏，是十分自然的。

同《明清卷》一樣，若以地域而言，在晚清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中，粵籍詩人仍佔極大比例，尤其是南海、番禺、順德、香山等處珠江三角洲的廣州府屬縣份。其中譚瑩、簡朝亮的潘飛聲，與上文提及的康有為、邱逢甲，皆晚清時代嶺南乃至全國知名的詩人、學者，這裡限於篇幅不一列舉，僅以在明清時代為澳門所屬，在晚清、民國時代仍與澳門關係十分密切的香山縣為例。載入本卷的香山籍詩人達十一人，超過本卷詩人總數的六分之一。其中較值得注意的是劉嘉謨、鄭觀應和楊應麟。

劉嘉謨（1777-1849稍後）字簡在。貢生，官通政司經歷，居京師五載，旋奉母歸隱，晚歲僑寓羊城。性喜遊歷，復耽吟詠。粵中名輩張維屏、黃培芳、譚瑩及釋純謙、蔡顯原等皆為吟友。道光二十年（1840）春，林則徐繼虎門銷煙、巡閱澳門及斷絕英人貿易之後，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廣東巡撫怡良奏請將高廉道易中孚移駐澳門，又派素有賢令之譽的樂昌知縣吳思樹署香山縣事。簡在在羊城獲悉這一消息，遂欣然賦詩云：“聞道蓮花澳，紛然肆犬羊。元勳忠作膽，異類狡為腸。服旂旌方駐，飛鳧鳥早光。新猷多雨露，草木遍春香。”對林則徐等的措施表示由衷贊美和支持。從詩中可以看出當時粵中尤其是香山縣士紳百姓，對林則徐這位近代中國偉大的愛國者的崇敬心情。

鄭觀應（1842-1922）字正翔，號陶齋。咸豐八年（1858）赴滬學貿。任英商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買辦。復自營貿易，投資輪船公司及礦業。以捐資得道員銜。歷任輪船招商局會辦，上海機器織布局、上海電報總局、漢陽鐵廠及粵漢鐵路總辦等。陶齋為近代中國愛國者及改良主義思想家。他於光緒十年（1884）中法戰爭期間，赴香港交涉中

國購買德國克虜伯大峯被扣事件，終將大峯二十五尊運回，支援抗法鬥爭。復冒酷暑赴西貢、曼谷和金邊等地偵察敵情。同年冬，因其抗法義舉招英人之嫉，被太古洋行藉口要其賠償所薦該行買辦虧欠四萬餘元，串同港英當局將其扣留，直至次年下半年始脫累歸里，在澳門鄭家大屋一住七年，寫成對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產生深遠影響的《盛世危言》。返澳之初，值鄭家大屋落成不久，作七絕〈題澳門新居〉二首。又審視當年澳門嚴酷的社會現實，作七古〈澳門感事〉，詩中以澳門本為中國領土，葡官在澳地包庇匪、窩娼聚賭、勒收公鈔、凌虐華民之事頗有感慨，切責華官華民“自謂文明實昏瞶，不識公法受愚蠹”，企圖通過《萬國公法》，向國際社會討還公道。其見識雖然遠遠高於同時代的中國人，但在當年強權出公理，弱國無外交的國際社會，這種想法顯然是無法實現的。

楊應麟一名瑞初，字訓強，光緒十九年（1893）舉人，分省試用同知，補用同知，不願為官，歸居舊里。所居下恭鎮北山鄉密邇澳門。宣統元年（1909）任廣東諮議局議員。因清廷與葡萄牙談判澳門劃界問題，返邑成立香山勘界維持會，任會長，堅決反對葡萄牙擴佔澳門以外的中國領土。復發起成立廣東勘界維持總會，任副會長。旋組織香山九十八鄉民團，反對澳葡在前山內河疏濬河道，越佔中國領海。瑞初為清末香山地方愛國紳士，在“風氣趨洋薄，邊聲近海饒”（梁喬漢〈登西望洋山頂〉）的年代，以桑梓密邇鏡湖，對歷年發生之事，感慨特深，遂作〈鏡湖感事十詠〉，以傳信史而抒懷抱。

在歐西新法教育尚未普及以前，中國的民間教育在晚清時代的澳門頗為流行，而塾師仍不失為當時較為貧寒的讀書人的一種謀生手段，因此有不少內地讀書人赴澳充當塾師，澳門詩的作者黃國培、楊增暉、梁鸞翔和梁喬漢便是其中的幾位，茲以黃國培和梁喬漢為例。

黃國培字煌業，號曼君，廣東香山人。增貢生，考授實錄館校對，議敘縣丞，歷官福建連城、甯德、長汀知縣。他大約於道光三十年（1850）

秋，應澳門友人之請赴澳。其後寄寓普濟禪院，在其中設帳授徒，直到咸豐元年（1850）春。其時同在澳中設帳授徒的還有蕭孝廉孟庚。在澳期間，曼君留下有關澳門的詩作十餘首。〈館於普濟禪院黎明僧送粥至〉云：“天風吹我鏡江遊，乞得虛堂粥一甌。半世生涯千卷拙，五更殘夢一鐘愁。心隨楚些爭蘭芷，口向莊生應馬牛。欲把書齋榜鬱鬱，未知嫌見辱余否？”中國的寺院數百年來亦保持這一傳統，這首詩便是一個例證。結聯二句意謂欲以“鬱鬱”二字作為齋名，書寫張貼於書齋之上，又恐被見嫌而將我侮辱，極為傳神地道出了一個寄居寺院的寒士的落泊心境。

梁喬漢（1851-？）字斗衡，廣東順德人。諸生。以饑驅至羊城等地設館授徒。光緒二十六年（1900）至澳設館。以澳地濱臨海外，別成一島，人煙薈萃，亦成都會，開闢之由來未盡煙沒，遂以公餘多暇，采摭舊聞，搜訪遺址，覽其方輿，考其風俗，倣宋方信儒〈南海百詠〉之意，作〈鏡湖雜詠〉五十首等，及香港雜事、雜感若干首，合刊為《港澳旅遊草》。〈鏡湖雜詠〉五十首包括古蹟名勝十五首、風土雜詠二十五首、夷俗雜詠十首，為吟詠澳門古蹟名勝、風土習俗的大型組詩。它產生於晚清時代，在澳門詩中繼清初吳漁山的〈粵中雜詠〉三十首，下啟民初汪兆鏞的〈澳門雜詩〉七十二首。雖然詩中屢雜堪輿家言，詩學造詣亦不及吳、汪兩家，然斗衡以一鄉間塾師，吟詠風土，記述見聞，擅於寫實，頗有佳作，與吳、汪兩家之作，同具詩史之價值，在晚清中國詩人吟詠澳門的詩篇中，居於重要的地位。

此外在晚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中，南海羅慧卿作詩五首，與同有才女之譽的民國時代冼玉清的詩作，可謂先後輝映。日本漢詩作者永井久一郎詩三首，為目前所能見到的澳門詩詞的惟一外國作者。

晚清時代屬於近代中國的前期，中國對外關係從古代型轉變為近代型。西方列強以堅船利炮為後盾，對中國進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的侵略和滲透，瓜分中國的慘禍逼在眉睫。中國詩人來到被葡萄牙強佔、強制推行殖民統治的澳門，往往將因

葡萄牙的殖民統治所發的感慨，和自身憂國傷時的情懷形諸吟詠。中國詩人常常在揭露葡萄牙的殖民統治的同時，寄托自己的感慨。如道光末年蔡球〈經澳門作〉句云：“天開神禹甸，地盡尉佗疆。鬼市抽人稅，民脂奉虜糧。誰為班定遠，生縛左賢王？”詩人見到澳葡政府強行向華民抽稅，官府搜括民脂民膏，支付鴉片戰爭賠款，遂慨歎世無禦侮卻敵的英雄，使西人得以在中國的領土上橫行。

關於澳葡當局強行抽稅的情形，鄭觀應〈澳門感事〉句云：“屋價千金抽八十，公鈔不納被官封。”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六首：

“煙酒公司權稅添，行囊夾載罰加嚴。誰人作俑增苛政，權利從教彼族兼。”皆詠其事。

至於澳葡凌虐華民的暴行，楊應麟〈鏡湖感事〉第四首：“禾黎龍田悵故閩，楚人一炬竟燒秦。白頭野老吞聲哭，一樣中原有棄民。”描寫光緒三十三年（1907）澳葡增闢馬路逼遷焚燬龍田村民居三十餘家，華民分離遷徙，慘不忍聞。而第七首：“莫愁誰更說盧家，人笠追豚試虎牙。賸有牆茨長不掃，蠻風吹墜女兒花。”則描寫葡人強佔華人少女，致令羞憤舍生。

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統治，引起中國詩人對明清時代澳門歷史的反省。明隆慶三年（1569）粵籍工科給事中陳吾德條陳借濠鏡與西洋事被一再詠及。潘鳴球〈遊澳門有感陳給諫借濠鏡與西洋事〉句云：“此地雜華夷，前人貪獻貢。久假不我歸，勢漸致狂縱。……卓哉陳給諫，先事鑒已洞。利害悉指陳，字字有餘痛。朝議奈堅持，斥為愚且戇。禍患起忽微，履霜即冰凍。”陳璧光〈澳門行〉則云：“胡為借與夷，事後遺煩惱？一筋在前明，國柄日顛倒。豈無秉哲士，憂心怒如憐。萬里叩君門，孤忠持諫草。今已數百年，傳聞有故老。吁嗟陳給諫，片言關大造。”陳吾德條陳濠鏡事在粵中民間故老相傳數百年。鴉片戰爭後，中國外患日亟，這一故事重新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潘鳴球和陳璧光的詩篇就是明證。

中國詩人來到澳門，目擊時艱，愴懷國事，悵觸無端，澳中景物引起的感慨和對家國憂患的繫念

往往交集胸中，發而為詩。潘飛聲〈濠鏡謁天后閣〉下半云：“竟棄珠崖傷弋子，重扶銅柱定何年。手持神珓趨臺卜，祝降波臣奠海邊。”這首詩作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即中日甲午戰爭的第二年，其時中國新敗，臺灣全島被割，給中國人以莫大刺激。詩人來到同樣淪入異國統治的中國領土澳門，深慨金甌殘缺，國土淪喪，世間祇有將祖國江山拱手送人的奸佞，何時纔能出現重扶銅柱收拾金甌的英雄？詩人在媽祖神像前虔誠禱祝，祈請神靈派遣神將波臣保障海疆的安寧。

張其淦〈慷慨〉云：“慷慨悲歌欲問天，眼中人竟老林泉。心如老驥思邊塞，身似飛鴻寄海天。赤血千家悲馬革，黃圖三輔起狼煙。可憐萬里中華月，照到遼東月不圓。”這首詩為光緒三十一年（1905）秋詩人在澳門聞東北日俄戰爭之事而作。日俄戰爭的戰場瀋陽為清代留都盛京所在地，故稱“黃圖三輔”；旅順口位於遼東半島南端，故稱“遼東”。全詩將家國之恨與身世之感，殺敵報國的理想與落拓天涯的現實形成鮮明對照，語最沉痛，可與陸游〈訴情衷〉詞“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數句相匹。屬於同類的詩作還有〈客思〉：“孰是桃源境？都無安樂窩。側聞遼左戰，已見海揚波。閭里空泉布，乾坤有網羅。廟謨多勝算，惟用止干戈。”詩中以網羅喻當政者用來對付異己及百姓的嚴刑酷法，謂當政者若有安邦定國克敵制勝的謀略，就應該用來抵禦外侮，平定列強侵略中國的戰爭。

箋注者在《明清卷·導言》中提到，生活在清代康乾盛世或乾嘉盛世的中國士大夫，多少帶有一種作為天朝上國子民的自豪感，時時將這種感情形諸吟詠，可謂“盛世人慣作豪語”。在清代的澳門詩中，便不乏這樣的盛世豪語。與此相反，晚清時代的中國詩人，處於國家民族危難之際，為詩多憂生念亂之作。他們所作的澳門詩亦多憂國傷時抒發對國家民族感情之什，可謂“衰世人多為悲歌”。如鍾兆霖作於光緒三年（1877）的〈澳門渡海感賦〉下半云：“顧誰早具終軍志，弔古終憐陸賈才。如此繁華好風土，卻教夷虜起樓臺。”又〈澳

門〉第四首下聯：“雲氣如輪東北去，微吟休作大風歌。”詩人借描寫澳門當年冬春之際東北風盛行季節的風沙，有感於當時國勢日蹙山河淪喪，慨歎世無鎮守四方的猛士，像漢高祖劉邦那樣吟詠〈大風歌〉一類的詩篇，祇有徒增悲憤而已。與“顧誰早具終軍志，弔古終憐陸賈才”二句寄慨同深。屬於同類詩作的，又如作於光緒十年（1884）陳燮疇的〈澳門〉下半：“窟藏蛇蝎污難滌，族混華夷患易留。獨抱私憂春且買，忘懷端賴酒盈甌。”結聯二句，反映了當時具有先進思想的士大夫憂國憂民而又無可奈何的心境。作於宣統二年（1910）楊應麟的〈鏡湖感事〉第一首：“海疆重鎮棄前明，一度胡笳一度驚。總是鯨魚吹浪起，至今江水未曾平。”這類衰世悲歌，到民國時代將繼續之，並賦予新的歷史內涵。

作品內容

晚清時代的澳門詩詞，同明清時代一樣具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其一，這些詩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晚清時代中國內地和澳門本地發生的歷史事件。如上文所引，劉嘉謨的詩反映了道光二十年爆發的鴉片戰爭；尹泰保的詩反映了光緒十三年（1887）的中葡條約交涉；潘飛聲的詩反映了光緒二十年（1894）的中日甲午戰爭；張其淦的詩反映了光緒三十至三十一年（1904-1905）的日俄戰爭。還有許多詩作所反映的若干歷史事件，下文按年代先後加以論述。

道光二十九年（1849），澳門中國百姓沈志亮等刺殺葡督啞嗎謀（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為晚清澳門史的一大事件。劉燾芬、鄭觀應、潘飛聲、邱逢甲和楊應麟皆有詩詠其事。啞嗎謀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任澳門總督，強行在澳門推行殖民統治，驅逐駐澳華官，強向華民徵稅，強佔華民田地。為了強佔三巴門至關閘之間的中國領土，開闢馬路，平毀沿途華民塚墓，棄滅骸骨，引起天怒人怨。沈志亮（又名米）與郭金堂等祖墓亦受其害，遂發謀設策，於七月初五日（8月22

日)在關閘附近將啞嗎謀殺死。兩廣總督徐廣縉害怕引起中外爭端,示意鄉紳鮑俊勸沈志亮自首。經審訊後,旋將沈處死,郭金堂遣戍。昔日前山寨西城下還有沈志亮墓,墓碑書“義勇沈公之墓”。劉燭芬的長詩〈沈義士歌並序〉,大約用詩人撰寫光緒《香山縣志·沈志亮傳》時所得的資料寫成,序文記述事件發生的原因和經過,可與縣志〈列傳〉互相印證。詩末描寫沈志亮殺死啞嗎謀後慷慨赴義的情形及人們對他的懷念:“胡兒控制府,制府心怦怦。義士挺身出,旁觀為目眩。陳情不少飾,响死還相爭。千金贖老母,公道人心明。坐者為起立,聞者為趨行。萬口說義士,義士今猶生。義士幸不生,群胡正驕猛。我嘗至其地,慨想忠魂馨。養癰者誰人?念之為涕零!”將這首詩及縣志〈列傳〉與事件發生時的中西文獻記載相比較,可知在事件發生的二十餘年後,沈志亮的原型已帶上若干文學色彩,成為民間萬口相傳的傳奇式人物。其它如潘飛聲〈澳門雜詩〉第五首:“田橫島上漢家兒,雙手揮戈事最悲。片碣誰題沈義士,不聞穿塚傍要離。”邱逢甲〈澳門雜詩〉第十二首:“誰報兇酋發塚冤?寶刀飲血月黃昏。要攜十斛葡萄酒,來酌秋原壯士魂。”楊應麟〈鏡湖雜詠〉第十首:“莽酋苛暴吏潛通,誰謂三軍勝匹夫?若憶當年沈義士,萬人爭看好頭顱。”語皆悲壯,對沈志亮充滿敬仰之情。其中潘飛聲詩原注:“澳督某橫暴。有沈米者,以鎌刀殺之馬下。後為某劣紳誘陷就殺。然沈墓前有人題曰:‘沈義士之墓。’”楊應麟詩原注:“道光季年,葡酋肆虐,民不聊生。左署遷避,大吏捫口。時有沈公阿米,刃殺葡酋,赴官自首,從容就戮。都人義之,至今歲時奉祀如故。”皆足以傳之後世,以成信史。

咸豐四年(1854)六月,廣東天地會首領陳開起義,佔領佛山。李文茂、甘先等響應。起義軍頭裹紅巾,世稱紅巾軍,迅速佔領東莞、增城、順德、從化、花縣、清遠、英德、三水、肇慶等州縣,並兵分三路圍攻廣州,與兩廣總督葉銘琛率領的清軍展開激戰,直至五年(1855)春始撤離廣州外圍,轉戰廣西。廣州及近郊近縣居民,紛紛逃往

澳門及香港。澳門又一次成為粵中居民避亂的桃源。譚瑩〈澳門人饋青洲蟹〉下半:“誰堪出將徵佳兆,人笑居夷乏遠書。聞說避兵仍踵至,大都留饗武陵漁。”所詠正是當時實情。蔡雲緬因紅巾軍之役,從順德避地香山,其〈夜話聽潮閣贈譚怨傳茂才並送之澳門〉句云:“月落寒潮湧,更聞話未央。波濤翻內地,遭際在他鄉。”又有〈喜家由澳門至鐵城〉:“披榛斬棘繞行程,路出蠻夷鼓角鳴。尚得生存天有幸,不須相見淚頻傾。”可見其時廣州郊縣居民以澳門為避地,或取道澳門前往未有兵災之地暫避者甚眾。

在隨之而至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國於咸豐六年(1856)借口“亞羅號”事件進犯廣州,被省城軍民迫退,但廣州十三行在衝突中燬於大火。七年(1857),英法組成聯軍,攻陷廣州,強佔廣州達四年之久。原在廣州十三行經營中西貿易的易瀾光因而避地澳門,其〈澳門秋夜〉句云:“意氣當年重行藏,此日蹉跎到海疆。……往事回頭皆是夢,癡心猶欲續黃梁。”詩人曾在其間慘澹經營、身家所寄的十三行,已在英軍進攻廣州時化為灰燼。“往事回頭皆是夢”云云,大約與此不無關係。約作於同時的葉棲鸞〈澳門有感〉下半:“祇知市易來商旅,那識邊防失事權。一統山河今若此,淒涼滿目亦潸然。”其時粵中經英法聯軍之役,省城未復,山河殘破,詩人潸然涕下,非獨為澳門也。

光緒二十四年(1898)發生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政治運動戊戌變法,為時僅百日,便遭到掌握軍政大權的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派的堅決反對而失敗。支持變法的光緒帝被幽禁,譚嗣同等六君子被殺害,康有為、梁啟超逃亡國外。在六君子被殺害後,維新派人士曾在澳門蓮峰寺舉行追悼會。劉翰棻〈蓮峰寺追悼戊戌政變殉難六烈士〉:“慟哭六烈士,忠君弗顧家。朝衣棄東市,血灌自由花。”其時中國內地正處在繼續搜捕迫害維新志士的腥風血雨中,本來屬於中國領土卻為“天朝政令”所不及的澳門,人們反而能夠在蓮峰寺從容舉行戊戌政變殉難六君子的追悼會,這一點可以視為澳門在維

護當時中國的進步事業中所起的積極作用。

康有為在流亡海外期間，於光緒二十五年（1899）九月從溫哥華（舊稱魏島）還香港，途中作〈遊魏島歸棹，望海思家，時太夫人及眷屬住澳門〉，詩云：“壁月亭亭出海邊，遠山近島紫凝煙。踴躍金輪海山碧，遙知濠鏡月同圓。”康有為除了於光緒十三年（1887）遊濠鏡觀馬戲之外，二十三年（1897）再度赴澳，在澳門鉅商何廷光的資助下創辦《知新報》，由胞弟康廣仁（戊戌六君子之一）和門人徐勤主持，成為在華南地區宣傳維新變法的重要陣地。變法失敗後，其老母妻女及梁啟超眷屬又避難至澳，次年遂有此詩之作。

張其淦的〈九如樓醉後放歌用放翁〈醉後草書歌〉韻〉則作於光緒三十一年（1905），即戊戌變法的七年之後，詩中云：“扶桑不返徐太史（謂徐研甫夫子），鄧尉已葬翁中堂（謂翁叔平夫子）。聞道貴陽李尚書（謂李苾園夫子），頗似太白歸夜郎。死生契闊數師友，驚呼痛哭真能狂。”徐仁鑄字研甫，江蘇宜興人，進士，光緒二十三年（1897）以編修授湖南學政，提倡新學。父致靖，官禮部侍郎，疏薦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可大用。戊戌政變後，致靖繫獄，仁鑄罷免。據詩中所詠，仁鑄蓋於政變後與梁啟超同逃至日本，旋客死。翁同龢字聲甫，號叔平，江蘇常熟人，咸豐狀元，歷官刑部、工部、戶部尚書，軍機大臣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光緒帝師傅，以輔翊光緒帝籌謀新政，支持變法，為慈禧太后所忌，在光緒帝頒〈明定國是詔〉開始推行變法數日後即被開缺回籍，政變後被即行革職，永不敘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光緒三十年（1904）卒於鄉。李端棻字苾園，貴州貴築人，同治進士，累擢內閣學士，遷刑部侍郎，支持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活動，密薦康有為、譚嗣同於光緒帝，旋擢禮部尚書，政變後被革職流戍新疆，二十七年（1901）赦歸，三十三年（1907）卒。翁同龢於光緒十八年（1892）以戶部尚書充壬辰科會試正考官，李端棻以內閣學士充壬辰科會試副考官，徐仁鑄充同考官，故皆稱夫子。詩人醉裡作書，所懷念的是這幾位因支持維新變法

而被貶斥放逐的師友，所哭訴的是知音寥落，死生契闊，不可復見的悲傷；字裡行間像陸游一樣飽含嫉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心，亦可作有關戊戌變法的史料讀。

紅巾軍之役、英法聯軍之役和戊戌變法屬於中國內地發生的事件，二辰丸事件、澳門劃界談判和過路環慘案，則與沈志亮案同屬於澳門本地發生的事件，同樣引起中國詩人的密切關注。

二辰丸事件發生於光緒三十四年正月初四日（1908年2月5日）。日船“二辰丸”為澳門華商廣和店譚壁理偷運槍枝彈藥，在路環附近大沙灘洋面為廣東水師緝捕輪船所獲。案發之後，日本公使照會清政府，聲稱該船是在澳門水域航行，指責中國水師違約越境截捕商船。葡萄牙公使亦發來照會聲稱“二辰丸”係裝載槍枝運卸澳門，該船被拿，有違葡國所領沿海權，並有礙葡國主權，阻礙葡國商務。清政府經甲午之役，畏日如虎，對葡亦一例羈縻。在日葡兩國壓力下，最後被迫全部接受日本公使提出的解決該案五項要求，中國主權特別是領海權受到嚴重損害。消息傳出，輿論譁然。粵中紳民自發掀起抗議示威及抵制日貨運動。何祖濂、林文聰和黃玉堂皆有詩詠其事。

何祖濂〈書二辰丸〉句云：“強權須藉公理施，國際衰弱奚見欺。西江捕權爭未已，重以辰丸惡感與日滋嫌疑。……豈不知紛紛民黨正思亂，嚴防私運搜軍資。豈不知領海主權屬中土，分明界線難遷移。胡乃恃強輒凌弱，顯與《萬國公法》相背馳。……政府畏日竟如虎，張帥〔兩廣總督張人駿〕束手何能為？雖我粵民奮起而力爭，中外函電交相貽，惟有提倡杯葛例，文明對待無他辭。……工商實業知振興，佔彼優勝寧無期？敬告薄海諸志士，毋但撫膺扼腕東望長歎歎。”慨歎國際社會的弱肉強食，企圖喚起國人振作，謀求國家民族的強盛。

林文聰〈記二（正）月初四日捕“二辰丸”，至十七日釋放事〉云：“游弋澎湖警電傳，畏人遽釋二辰船。竟忘經緯分明處，應有完全緝捕權。軍火百三十六號，倭銀二萬一千圓。可憐鳴峯放行

日，國恥長懷卅四年。”游弋澎湖謂日本派軍艦至澎湖游弋，向清政府施加壓力。鳴崙放行謂在釋“二辰丸”時派兵艦在該船停泊之處鳴崙道歉。日使提出的五項條件為道歉、賠款、懲官、釋船、收買被扣軍火。其中尤以鳴崙道歉一項粵人視為中國之奇慙大辱，結聯所詠正是當時社會輿論的反映。

“二辰丸”案交涉失敗後，粵中紳民強烈要求清政府盡快與葡萄牙政府談判澳門劃界問題。宣統元年五月至十月（1909年7-11月），清政府以雲南交涉使高而謙為勘界大臣，與葡國勘界專員馬鐸度（Joaquim José Machado）在香港舉行澳門劃界談判，終因葡使索地過多，無法達成協議而告結束。談判期間，香山士紳、百姓組成“香山勘界維持會”，廣東各界人士在廣州成立“廣東勘界維持會”，研究澳門歷史及國際法理，搜集澳界證據，以保國權而捍鄉土。劉珩〈澳門劃界〉：“強客翻為主，從何地界分？國危因佔據，歲久仗傳聞。保守嚴疆土，爭論恃約文。汶陽如畫返，口舌策殊勤。”這首詩意謂西洋人本來係作為客人寄居中國的領土，如今卻反客為主，來與中國劃分地界，然而澳內澳外都是中國的領土，兩國的地界何從劃分？西洋人乘中國衰弱，國勢險危，佔據澳門及其附近的土地；由於年代久遠，文獻無徵，他們祇能將得諸傳聞的說法作為佔據的理由。華使在談判中，每據中葡〈通商和好條約〉第二款：“惟現經商定，俟兩國派員妥為會訂界址，再行特立專約。其未經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照依現時情形勿動。”與葡使爭論，駁斥其婪索中國領土的要求。汶陽二句借春秋時期齊國歸還魯國汶陽之田，喻華使據理力爭，索回被葡人強佔的中國領土，為對華使的期望。全詩反映了當時香山士紳、百姓對澳門劃界問題的關切。

過路環（又稱路環）慘案發生於宣統二年（1910）六月間。其時廣東新寧（今臺山）、開平發生教案。十七名天主教徒子女被擄至路環島上藏匿。教民稟告兩廣總督袁樹勳，袁因“澳界尚未勘定，不便派兵前往”而遲疑。教民求救於澳門主教，澳葡當局即以此為藉口，以“剿匪”為名，派

軍隊進攻路環。島上居民聯絡海盜對抗葡軍，擊退葡軍三次進攻，擊斃葡兵數名，並奪回峇臺。澳葡當局以軍艦峇轟，一連數日，繼而葡軍登陸，縱火焚燬九澳全鄉，鄉民數百家毀亡。

易順鼎時在署廣肇羅道任上，有感於官府無力攻剿路環島上的“真賊”，讓澳葡借“剿匪”之名，攻佔本來屬於中國領土的路環島，並不分良莠，殘殺鄉民漁戶，而將粵西地方因抗捐或仇教之事與官府稍有爭執的陳姓村民三百口誣為“盜賊”，動用官兵闖村殺盡，以無辜百姓的鮮血染紅自己的頂子。遂作〈新樂府二首〉、一為〈過路環〉，一為〈崇正團〉。〈過路環〉詩中借客人之口，敘述慘案發生的經過，詩末云：“我有兒女我不哺，我有盜賊我不捕。任教異類我同胞，更使喧賓來奪主。我謂客勿然，彼特助我殲神奸。君不見粵東今有過路環，粵西又有崇正團。”全詩反映了當時國勢積弱，官邪政亂，不恤民艱，反而聽任西人草菅民命濫殺無辜的社會現實，格調頗似白居易《新樂府》諸詩。

其二，這些詩詞反映了晚清時代澳門的教育事業，煙、賭、娼妓等特殊行業，以及曾經盛極一時的苦力貿易。中國古代的民間教育，以私塾、家塾、書院為主要形式，這類教育在晚清時代的澳門與歐西新法教育並行。幾位赴澳充當塾師的澳門詩作者，為我們留下了這方面的記載。

道光末年黃國培的〈送別蕭孝廉孟庚並柬其周張兩弟子〉附題“時館於澳門之望廈村普濟禪院”。第一首句云：“恰如南郭喜連牆，絳帳相逢正未央。”第三首句云：“雙雙問字兩侯芭，與我情投添莫加。”詩人其時設館於普濟禪院，而蕭孝廉孟庚的書館，當設於禪院附近，故稱連牆。蕭孝廉有張明波及周姓兩弟子，與詩人亦有往還。順德楊增暉以舉人於光緒年間數度至澳，設帳講學。光緒十八年（1892）會試落第後再度赴澳，作〈重到澳門感懷有賦〉：“書劍飄零恨倍長，天涯還訪白雲鄉。昔年春酒羔羊地，今日秋風蟋蟀場。東閣梅殘仍近水，南灣草長未經霜。舊遊桃李歸何處？絳幄依然講學堂。”從黃國培、蕭孟庚到楊增暉，中

國士人到澳設帳講學，實行舊式的書院教育，若將這類詩篇與其它文獻互證，當有頗清晰的脈絡可尋。

陽江梁鸞翔赴澳所教則屬於家塾。他本來在港為某君西席，光緒二十四年（1898）隨居停主人至澳，同年為居停主人所解聘，而仍篤於師生之誼，向他的兩個學生賦詩贈別。〈孟冬初三在澳留別方度、靖琴兩棣〉句云：“萍寄籬邊覺五年，幾回開卷話燈前。……此日異邦分手別，向時講席愧心傳。”“來時不及歸時喜，無青終贏有青閒。……祖鞭別後須勤妹，我愧風塵鬢已斑。”詩中對被解聘一事持不卑不亢態度，而對兩棣則情深意摯，善誘循循，不失為人師表本色。晚清時代澳門的歐西新法教育通常由教會興辦。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五首：“蒙養脩儀尚恤貧，善門教澤溥如春。地名義塾三巴仔，就學年來過百人。”就描寫聖若瑟修院（三巴仔）的義塾，從詩中可知，當時就學的貧民子弟逾百人。

澳門的煙、賭、娼妓等特殊行業，其起源大致可追溯到清代前期。由於當時澳門對外貿易衰落，來粵貿易的其他西方各國商人，貿易季節以外的時間大多以澳門為居留地，娼、賭等業因西方商人的畸形消費而逐漸發展。在葡商和其他西方商人的共同經營下，澳門一度成為鴉片貿易的中心。鴉片戰爭後，英國強佔香港為殖民地，中國實行五口通商，澳門對外貿易更加衰落，鴉片、娼、賭等業及苦力貿易畸形繁榮，成為經濟的主要支柱。下文分別略予論述。

晚清時代，隨着中國內地鴉片貿易合法化和英國通過香港壟斷對華鴉片貿易局面的形成，澳門成為鴉片分銷中心和鴉片煙館聚集之地。楊增暉〈澳門吟〉第三首腹聯：“花月樓臺香引蝶，煙雲世界影迷鴉。”描寫當年澳門的妓院和煙館。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二十三首：“生涯獨擅有同聲，公棧牌名客路行。鶯粟膏香誇壟斷，聚工千百慕羶成。”描寫煙館和煙膏製作。楊應麟〈鏡湖感事〉第三首：“大三巴外小三巴，雨向煙村屋萬家。聚鐵鑄成千載錯，忍將鶯粟換桑榆。（澳地

沃壤交錯，人民繁盛。與葡通商絕無利益，販賣洋藥（鴉片）一件，種禍尤烈。）”則寫販賣鴉片一行對澳門的重要性及其危害之大。

當年澳門的賭館，與鴉片煙館一樣興盛，有邱逢甲〈澳門雜詩〉第十四首為證：“門牌高署市門東，百萬居然一擲中。誰向風塵勞物色？博徒從古有英雄。（澳中賭館最盛，門皆署銀牌以招客。）”至於賭博的形式，陳徵文〈蠓鏡雜詩〉第五首：“商賈休將寶貨誇，呼盧喝雉有生涯。漏卮誰為中華塞？百萬朱提買榜花。”簡朝亮〈澳門〉：“大眼魚舵汎海家，澳門口岸阻浮沙。萬人爭入葡萄國，市利何如卜榜花。”梁博珍〈乙未澳門旅日〉下聯：“春色漸闌欣作客，榜花開放笑相迎。（卜榜花以澳門最盛。）”卜榜花又稱闖姓或圍姓，即用科舉考試士子中式的姓，以猜中多少為輸贏的一種賭博形式，最初起源於廣州，後以內地禁賭而盛行於澳門，成為澳葡當局餉源的大宗收入。賭博的其它形式為番攤和白鴿票（彩票）。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十九首：“賭餉承充累萬千，番攤圍姓藪淵連。草堆街畔人如蟻，煙火家家不夜天。”第二十首：“一月公司聚一回，彩票成例澳中開。舊時呂宋原機器，移向恆和會裡來。”和會經營白鴿票用機器開票，其設備顯然較內地勝出一籌。

當年澳門的福隆新街、宜安街和福榮里一帶妓館和歌樓舞榭林立，與賭館和煙館一樣生意興隆。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十七、十八首分別寫妓館和歌樓：“妓館迷離客棧旁，沿門倚笑競時妝。年來衣飾翻新樣，錯認歌場即戲場。”“酒樓歌管月明中，釧響釵光醉臉紅。曲罷燈闌人已杳，歡場未免太匆匆。”張其淦〈寓客邸九如樓，倣放翁〈乙丑往來湖中戲成絕句〉之作〉二首亦寫歌樓，如第一首云：“江山如錦月如銀，解語花環四座春。醉裡賦詩難寫怨，斷腸分付唱歌人。”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邱逢甲〈澳門雜詩〉第五首：“冶葉倡條複茁芽，雙瞳翦水髻堆鴉。春風吹化華夷界，真見葡萄屬漢家。（駐澳葡人多非捲髮碧眼之舊，或謂為水土所化云。澳中尤多洋妓。）”描

寫澳門的土生洋妓。由於前代中西血統的通婚混血，已變為黑眼睛黑髮，還梳紮中國婦女的髮髻。她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招搖於風月場中，向華洋客人賣笑，大約為當年澳門所特有的景象。至於楊應麟〈鏡湖感事〉第二首：“博場歌館充官帑，海寇逋臣作上卿。留得蒼生無限劫，釵環執携伴宵行。

（澳門嫖賭成風，奸屍托庇，民同化外，搖蕩卑鄙，為吾族羞。）”大約代表當時廣東地方人士對澳門博場歌館危害性的一般看法。

苦力貿易又稱華工出國，粵中俗稱賣豬崽，大約起源於清代乾嘉之際的廣州口岸，澳門是一個重要的發源地，沿至晚清道光之際逐漸發展，同治年間達於全盛。到同治十二年（1873）里斯本朝廷宣佈禁止澳門進行該項貿易時，澳門的豬崽館已達三百多家，經營該項貿易的商人多達三四萬人。大約作於同治九年（1870）的梁煦南〈澳門行〉下半：

“中遠隆起駝峰高，桐棺半斷寒燐號（脩路求直之故）。塞草不青骨自白，陰霾大漠翻松濤。髑髏髑髏也休怪，汝若後死當豚賣。琅璫陣陣愁無顏，夷人買人行開山。（買華人往外國墾荒，名賣豬崽，館所數百間。）”其詩寫於苦力貿易在澳門大行其道之時，髑髏四句將詩人憂國憂民至為沉痛的情懷，在平澹之中出之，風格頗似白居易《新樂府》，而又賦予新的時代內容，與其大約作於同時的五古〈賣豬崽〉，皆為苦力貿易的珍貴史料。

其三，這些詩詞反映了晚清時代澳門的華人社會和土生葡人社會，以及兩者之間各異其趣而又互相融合的禮俗習尚。

當年澳門的華人社會，大致可分為上層和下層。描寫上層社會的有張其淦〈朱門吟〉：“朱門正在高樓邊，胡葩拂柳春風顛。方花麗礎九楹開，中有笙歌聲接天。金壺銀漏催落日，電光如月滿瑤室。用錢卷起黃河來，旁人話有點金術。半生歐美經營多，歸來三百列翠娥。卻言珠江不可住，祇有此間安樂窩。亦非苛政猛於虎，實恐豪客乘橐駝。寄言卜式良有以，何不來朝漢天子？”詩中所描寫的“朱門”主人，並非內地傳統的官僚顯宦，而是寄居澳門新起的鉅富豪商。他在歐美半生經營成為

鉅富，攜資歸國作富家翁。其時珠江三角洲盜匪充斥，為害之烈，對於他們來說甚於苛政，祇好寄居澳地。高堂華屋，姬妾環列，夜夜笙歌，備極奢侈。詩末寄言二句奉勸“朱門”主人稍存報國之心，做點有益於國家民族之事，可謂嚴正懇切之語。

描寫下層社會的，有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十一首：“物產魚鹽是處多，商人重利貨漁苛。窮洋歷盡風波險，拚累妻孥奈債何？”描寫漁民向漁行商人借高利貸，雖歷盡風濤之險，所獲盡用於還債，以至無力養活妻兒，陷於妻離子散的悲慘境地。第十二首：“賃車一月費金多，辛苦生涯力自任。度日有餘租不足，得償枵腹稅難禁。”描寫人力車夫向車主賃車，辛勞所得，本來可供度日而略有剩餘，但償付租金，生活費即感不足，再加上雜稅，祇將挨餓。第二十二首：“火船初泊客心忙，蜑女車夫亂進艙。行李步隨憐蜑妹，豈真車費價嫌昂？”客輪剛剛停靠碼頭，蜑家女和人力車夫爭先恐後，進艙拉客。詩人寧願徒步，而僱一蜑女手提行李隨後，並非嫌車費太貴，因為蜑女的謀生手段，要比車夫更為艱難。這三首詩皆描寫下層百姓生活的艱辛。

在晚清時代，世代居住澳門的葡萄牙人被稱為土生仔，即土生葡人。中國詩人向來對他們給予關注。梁喬漢〈鏡湖雜詠·夷俗雜詠〉第六首這樣描寫西洋少女：“冰綃障面盼多姿，腰細湘裙疊雪垂。漫說珠娘佳麗盡，西方原有美人思。”西洋青年男女在婚姻擇配方面享有較大的自主權，不同於中國青年男女稟父母之命依媒妁之言，這種情形亦見諸梁喬漢同上詩第七首：“婚娶何勞遣妁聯，兩人各自目成先。及瓜閨幼知憐嬌，隨地留心看少年。”

居澳西洋人世代保持信奉天主教的傳統。梁喬漢同上詩第一、二首描寫天主教每年奉耶穌和聖母的聖像出巡的情況：“歲例爭傳救祖公，春聞國難訃喪同。拈香一夜生還慶，十字扛歸大廟中。”

“一年兩度出觀音，大廟迎來旅若林。扈從十分虔謹事，沿途經咒誦沉吟。”以耶穌為西洋人之祖

公，以觀音類比聖母，亦同清代詩人一樣帶挾中國文化的眼光來看待代表西方文化的天主教。

由於長期中西血統的通婚混血，澳門土生葡人大多帶有中國血統，上文所引邱逢甲筆下的土生洋妓便是一例。其飲食習慣，亦頗受中國影響，如潘飛聲〈澳門雜詩〉第四首：“白飯晨餐鼓（鼓）與蝦，烏龍猶勝架非茶。髮睛黑似吾華種，已改葡萄屬漢家。”

其四，這些詩詞反映了晚清時代澳門的中西文化交流。鄭觀應〈澳門感事〉句云：“華人神誕喜燃峯，葡人禮拜例敲鐘。”概括揭示了宗教文化方面中西禮俗的不同。宗教文化屬於上層建築的一部份，不同性質的文化之間交流較為困難。然而在飲食文代和物質文化方面，中西文化的交流卻頗為活躍。如上文所述，澳門西洋人的飲食習慣，頗受中國的影響；中國人的飲食習慣，亦頗受西洋的影響。吳亮珽〈澳門〉句云：“椰菜絮羹名士味，巴菇香草美人魂。”意謂以原產自西洋的椰菜烹調的菜羹鮮美可口，合於名士的口味；澹巴菇（煙草）帶有香味，吸後令人陶醉上癮，彷彿是美人的魂魄所化。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十首：“麵包乾餅店東西，食味矜奇近市齊。飲饌較多番菜饌，唐人爭說芥喱雞。”第二十四首：“水從化學煉加鹽，滌暑招涼力倍兼。嚼雪幾人同荔啖，賣喧忘卻候趨炎。”可知居澳華人較內地更早品嚐到麵包、餅乾、西餐和冰淇淋。

近代西方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物質文明空前豐富，除了明清時代已經出現的西洋風琴、千里鏡外，蒸氣輪船、自行車、攝影、郵票、電報等西方事物，亦在晚清時代出現於澳門。

蒸氣輪船最初出現於鴉片戰爭前夕的廣州口岸，鴉片戰爭以後逐漸增多。晚清時代吟詠澳門的詩人，留下有關蒸氣輪船詩作的有何紹基、蔣超伯、張品楨和梁鸞翔。何紹基和張品楨皆描寫來往於澳門與香港之間的輪船。何紹基〈乘火輪船遊澳門與香港作……〉首段云：“火激水沸水輪轉，舟得輪運疑有神。約三時許七百里，海中更比江行駛。不飄不篙惟恃爐，爐中石炭氣燄粗。有時熱逼

頗難避，海風一涼人意蘇。”張品楨〈由香港乘輪至澳門〉句云：“浩渺煙濤裡，雙輪激電機。……大川今可濟，休怯此身微。”梁鸞翔〈念九往澳在江通輪渡作〉描寫乘輪船從廣州往澳門，第一首云：“鄂君被擁最堪眠，忘此勞身卻在船。恰似雨雷聲繞耳，（船中聞輪聲、水聲，似雷雨交喧。）誰知紅日滿晴天。”〈六月初十日，由澳出羊城，在江通輪渡作〉則描寫自澳往穗。大約江通輪渡為當時專門航行於穗澳之間的蒸氣輪船。

自行車粵人稱為單車。梁喬漢〈鏡湖雜詠·夷俗雜詠〉第十首詠單車云：“單車並不費人牽，獨坐中衡自轉旋。兩腳踏將機起伏，輪行前後快如弦。”羅慧卿〈荷蘭園看葡童鬥單車戲吟〉：“笑指葡童八九齡，鬥車遊戲過園亭。勝優敗劣原公理，手段全憑運動靈。”則描寫在荷蘭園舉行的葡童單車比賽。

攝影技術在1827年發明於法國，道光二十四年（1844）法國攝影家伊地埃（Jules Itier）在廣州和澳門首次拍攝關於中國的照片。至光緒三十一年（1904），區達名有〈避暑南環，澳友偕遊馬交石，拍照索題小影相贈〉，第二首云：“獨立蒼茫東海東，斯人不與眾生同。看來似我還非我，我在空明一鏡中。”說明其時攝影技術在澳門已開始普及。

至於郵票和電報，梁喬漢〈鏡湖雜詠·風土雜詠〉第七首：“士擔郵政寄書憑，輕重錙銖次第增。自載封函垂例罰，每防瞞漏察行滕。”士擔又作仕擔，為英文Stamp（郵票）的音譯。蓋當時澳葡當局有嚴禁夾帶書函的苛刻，故下聯二句云云。同上詩第八首下聯：“捷傳萬國安危信，不及香江電線頻。”則詠當時澳門與香港間的電報服務。

其五，這些詩詞描繪了當時澳門的山川勝景。不但清代詩人所描繪的媽閣、蓮峰、青洲、大三巴、東西望洋山被寫入吟箋，在晚清時代被澳葡逐漸擴佔的望廈、龍田、沙岡、塔石等村和由仔、路環兩島也為詩人們的詩筆所描繪。茲略舉數首，以概其餘。潘飛聲〈澳門雜詩〉第三首：“葉葉風帆出樹籃（梢），望洋東去鶴歸巢。荷蘭一帶花園路，斜日輕車看馬蛟。”嵌入東望洋山、白鶴巢、

荷蘭園及馬蛟石四個地名，能將其與相關的景物融為一體，毫無堆砌之跡，堪稱意匠妙手，神來之筆。

其它吟詠各個勝景的，如梁喬漢〈鏡湖雜詠·古蹟名勝〉第二首：“南灣風景足句留，入畫爭傳五大洲。山水天然成位置，第三名勝紀環球。（聞泰西人遊歷者，謂此處南環為五大洲中第三佳境。蓋真山真水，成為自然，不假人工造作云。）”直以南灣（又稱南環）為世界第三勝景。青洲為澳門西北的一個小島，邱逢甲〈澳門雜詩〉第十五首：“仙洞雲封萬竹深，隔江勝地負登臨。倚樓幻作蓬瀛想，一角青洲出海心。（擬遊竹仙洞，未果。青洲，在海中。）”詩人在澳門西面的洋樓倚欄遠望，隔江北山鄉附近的竹仙洞煙雲繚繞，翠竹萬竿。青洲孤懸海中，恍若蓬萊、瀛洲。他想慕青洲風景幽美，但苦無路可通，遂有此詩之作。

至於被澳葡擴佔的三巴門與關閘之間的中國領土，邱逢甲〈澳門雜詩〉第十首：“四山高拱砲臺尊，海氣空濛晚角喧。落落老兵扶醉去，斜陽一角望霞村。（山上各有砲臺，然皆舊式；望霞村，即旺廈。）”詠夕陽下的望廈村（又稱旺廈、望霞、望下），以及望廈峯臺和屹立於山頂的其它各座峯臺。梁喬漢〈鏡湖雜詠·古蹟名勝〉第九首：“龍田村外路高低，異卉奇葩簇地齊。界劃菜鋪疑錦扇，半成繡陌半香畦。”描寫澳葡擴佔東望洋山下龍田村外的土地，闢成花園，裝設自來水管，引山泉噴灌的情形。

由仔、路環兩島，位於澳門半島之南，十字門東側，屬於十字門四山，大約在光緒初年為澳葡所擴佔。由仔又稱龍頭環或龍環，梁喬漢〈宿龍環嶼〉：“浪跡超塵外，何年闢草茅？屋盤山水曲，荒裔夏彝文。蜚雨蠻煙窟，魚燈蟹火巢。催科人不到，境界夢槐梢。”結聯二句，意謂其地民無官府催科之苦；天下擾攘，祇有此地尚為清靜，堪作槐安之夢。實際上當時澳葡已在由仔、路環築有峯臺，派兵駐守，向華民勒收船牌業鈔，龍環嶼並非田園詩般的恬靜。而前引易順鼎筆下的路環，則是一幕血淋淋的慘劇。

藝術特色

在探討晚清澳門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和作品內容以後，下文將進一步探討這些作品的藝術特色。

晚清的澳門詩詞亦以詩歌佔絕大多數。就詩歌體裁而言，歌行、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絕、七絕諸體俱備，茲就其較具特色者略予論述。

歌行通常以五古、七古的形式出現。上文所舉諸詩中，劉燾芬〈沈義士歌〉為五古；魏源〈澳門花園聽夷女洋琴歌〉、何紹基〈乘火輪船遊澳門與香港作……〉、梁煦南〈澳門行〉、尹恭保〈爭濠鏡〉和易順鼎〈過路環〉為七古，多屬紀事長篇，其中不乏較具藝術特色者。如魏源詩筆雄浩奔軼，文字軒昂多變，格調高奇峭厲，堪稱名篇。其它作為五古和七古而較具藝術特色的有黃國培的兩首詠梅詩。五古〈普濟禪院玉疊梅〉借羅浮美人的典故，採用擬人化的藝術手法，謂普濟禪院盛開的玉疊梅，就是來自羅浮的月下美人，而詩人則以隋趙師雄自況，言羅浮美人踏姝月色來到禪院相訪，與詩人共語，煮酒對飲，酣歌西廂，不覺醉寢。然一醉醒來，祇有殘月照姝空樑，無限惆悵而已。七古〈普濟院外園梅樹〉亦詠普濟禪院山園梅花，詩中借用蘇軾黃州定惠院海棠的典故。蘇軾之酷愛定惠院海棠，實從海棠中自寓身世感慨；詩人之憐惜梅花，亦借流落山寺被視同草菅的梅花，自寓懷才不遇的感慨，可謂異代同調。詩末云：誰知此梅不為意，枝幹橫斜殊自遂。嗒影依稀向我言，高人空谷何妨寄。蜚雨蠻煙也不嫌，蘿藤何怕相膠黏。嘆息海棠難定老，無乃不達訾蘇髯。我聞此言殊惘惘，欷歔因作隨緣想。”借梅花之口故作曠達語，正是這種感慨鬱積胸中，久久無法排遣的寫照。

五律中較具特色的為幾首和韻之作，包括張玉堂〈謁媽閣廟〉、布衣〈題媽祖閣石壁〉、釋暢瀾〈題媽祖閣石壁〉二首、釋遂昭〈題媽祖閣石壁〉和陳應科〈寓鏡湖媽閣遂昭師禪房題石〉，創作年代始於道光，止於宣統，貫串整個晚清時代。在古詩韻中皆屬青韻，實為乾隆末年張道源〈題媽祖閣

石壁》的和韻之作，皆勒於媽祖閣石壁。其中亦不乏佳作。如布衣所作：“古木涵江影，峰奇擎石亭。魚龍沾佛法，鳥雀帶仙靈。水鏡雲磨碧。山屏雨洗青。蓮花開世界，煙靄遍南冥。”全詩氣格高遠，在張道源五律的和韻之作中屬於上乘。腹聯水鏡二句，造語新奇，對仗工巧，堪稱佳句。陳應科所作：“泥雪鴻初印，尋僧到閣亭。新詩參妙諦，古剎毓仙靈。雲擁千峰碧，波涵萬頃青。勝遊人未倦，林靜晚煙暝。”詩人除作這首詩之外，還在觀音閣西側石徑頂上勒有“說法點頭”四字。“說法點頭”源於東晉名僧竺道生“頑石點頭”的佛門掌故，事見《東林蓮社十八高賢傳》，後用以形容法師道行高深，說法令人信服。詩人此遊，寓遂昭法師禪房，大約曾與紀文、遂昭兩法師談論佛法，又見媽祖閣周圍同道生說法的蘇州虎丘山一樣巨石嶙峋，遂用頑石點頭之典，勒下“點頭說法”四字，留贈兩位法師。首聯泥雪二句，正謂與兩法師結緣。頤聯新詩一句，新詩者，相對於遂昭師原題而言。參妙諦者，可與“說法點頭”互為注腳。

七律諸詩亦不乏佳作，如張玉堂《遊澳門海覺寺》：“何須仙島覓蓬萊，海覺天然古剎開。奇石欲浮濠鏡去，慈雲常護鯨帆來。蓮花湧座承甘露，榕樹蟠崖蔭玉臺。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頤聯奇石二句，將媽閣山的奇石、媽祖神和駛入內港的船帆渲染得神奇而有致。梁九圖《十二石山齋叢錄》卷二列為佳句。媽祖閣山徑崖壁間多石刻題詠，其中頗有佳作，故結聯“誰向名山留妙筆，淋漓潑墨破蒼苔”云云。許炳璋《題友人〈澳門送別圖〉》：“天風吹浪海門秋，十五年華憶舊遊。喜見句題留別處，坐令夢上解醒樓。日沉樹杪千帆暝，濤撼山嶺萬石浮。寄語他鄉休久戀，故人林下待歸舟。”這首詩的高明之處，在將詩人自己的感情與友人圖中的畫意緊密結合，融為一體。結聯寄語二句，視為圖中友人贈別之語，或詩人對作圖友人之贈語，皆無不可，在歷來題澳門圖的詩作中，別具一格。

七絕諸詩在選入本卷的詩作中佔很大比例，特別是組詩的創作。其中陳徵文《蠓鏡雜詩》八首，

潘飛聲《澳門雜詩》十二首，邱逢甲《澳門雜詩》十五首，梁喬漢《鏡湖雜詠》五十首，楊應麟《鏡湖感事》十首，合計九十五首，超過全卷篇數的三分之一。不少篇章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堪稱詩史。

其他詩人所作七絕，佳作尚多，如鄭觀應《題澳門新居》第二首：“三面雲山一面樓，帆檣出沒繞青洲。儂家正住蓮花地，倒瀉波光接斗牛。”下聯二句意謂吾家正住在素有人間仙境之稱的蓮花寶地，在星漢燦爛的秋夜，若將家門前的海水顛倒，流瀉天河，便可以連接天上的北斗星和牽牛星，可謂獨發奇想，言人所未能言，不讓唐人佳句。

詞在收入本卷的作品中祇有張逸所作的二首，其《浣溪沙·馬交石感遇》：“晚步徜徉鏡海邊，馬龍車水門輕便。好花瞥眼一枝嬌。時世梳妝濃淡改，風鶯飄泊景情遷。那堪回首憶當年。”這首詞作於光緒三十二年（1907），為作者早年作品。上闕寫晚步馬交石海邊見到車水馬龍士女遊冶的盛況。下闕抒寫時異世遷好景不常的感慨。作者丹青妙手擅於填詞，其時舉步艱難，身世飄泊，感慨獨多，觀其題名“感遇”知非無病呻吟之作。

結 論

晚清時代的澳門，作為被葡萄牙強佔的中國領土，中國詩人依然向這片土地傾注巨大的熱情。加上祖國積弱，遭逢喪亂，身世飄搖，目擊時艱，淒涼滿襟，所為詩詞多憂生念亂，愴懷國事，抒寫民族感情之作。其它詩詞，或描寫澳門及其周圍的山川勝景，或描寫澳門的中國百姓及其風俗習慣，或描寫在澳所見的西方事物以及居澳葡人的風俗習慣和宗教傳統。其藝術形式與中國古典詩歌一脈相承，藝術手法既借鑒中國古典詩歌的名篇，又大量運用中國古代的典故。這些詩詞，同樣是晚清文學和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份，其中不乏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資料，從中可見澳門與中國內地依然保持血肉相連的歷史文化聯繫，和澳門在這一時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依然佔有重要的地位。